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胡耀邦同志是发动者

邓小平同志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



胡耀邦

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沈宝祥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胡耀邦

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沈宝祥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 沈宝祥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4 (2005.11 重印)

ISBN 7-210-03163-4

I. 胡… II. 沈… III. ①真理的标准 - 讨论 - 中国
②胡耀邦 (1915~1989) - 思想评论
IV. B023.3 ②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 第 038095 号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沈宝祥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5 插页: 6

字数: 390 千 印数: 4001-6000 册

ISBN 7-210-03163-4/B·116 定价: 28.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 6898827 电话: 6898893(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胡耀邦同志是发动者

邓小平同志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



沈宝祥

中央党校教授。1932年生，江苏武进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1965年初到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6月起，在胡耀邦同志指导下参与筹办《理论动态》，后从事撰稿和编辑工作，先后任理论动态组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发表论文300余篇。在拨乱反正中，有30多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的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发表，其中多数由新华社转发。主编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的回顾、思考与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学习纲要》等13本书。专著有《温故察今论党风》《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现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完整体系。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为指南，去进行研究，坚决反对象林彪、“四人帮”那样抛弃原著的精神实质，摘取片言只语，实用主义地加以运用，以及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将马列和毛主席针对某些具体情况作出的指示搬用于根本不同的情况等做法。毛主席说得好：“如果西人说，毛说马恩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2)“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应当在马列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总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得到成绩，有了胜利，才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

作者

手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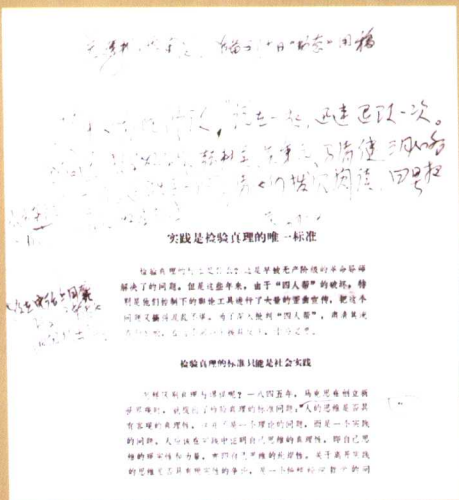
邓小平题写

1978年5月，邓小平、叶剑英在一起。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有力的支持者，叶剑英是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提议者。



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胡耀邦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是第一次审阅的文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这是早就老问题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把持，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御用工具进行了大量的蓄意宣传，把这个问题又翻弄出来，为了篡改马列主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在工人中间制造混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真理的标准问题与认识论是一而二五的。哲学史上曾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真理标准，但只有一个是正确的，那就是社会实践。因为一个真理的标准，必须是一个实践的真理。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即自己的思维活动与客观事物相符合，才能达到真理的目的。真理是客观的，思维活动是主观的，只有当思维活动与客观事物相符合时，才能达到真理的目的。

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



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真理标准问题书籍。



在大讨论中，秘书陈维仁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这是他们的合影。

本书作者和夫人王松筠与李昭、胡德平在耀邦像前合影。



在关键时刻，罗瑞卿的支持起了关键作用。



罗瑞卿指导下的《解放军报》别开生面地报道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书法家协会前主席启功题写
(原载《人民日报》)。

實踐是檢驗真理
的唯一標準

一九九三年冬日 啓功謹書



還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题写
(原载《人民日报》)。

實踐是檢驗
真理的唯一標準

紀念

沈鵬
丁巳年
同治庚辰
二月
周金記



胡耀邦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江西共青城，是胡耀邦的永久安息地。1995年11月25日，在此隆重举行胡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活动。本书作者应耀邦夫人李昭之邀，前去参加。这是本书作者拍的照片，李昭在耀邦陵讲话。



重印序言

本书原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全面翔实地记载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一历史事件，1997年12月出版，以后又加印，早已销售一空。现决定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书名改为《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在1998年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曾说：“回顾这场大讨论，要讲五句话：胡耀邦同志是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同志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罗瑞卿、谭震林、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坚决有效地给以支持；广大干部特别是省一级和大军区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庞元正、刘维林主编：《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90页）这场大讨论的成功，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万事开头难。胡耀邦同志作为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功不可没。今年是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特将此书改名为《胡耀邦

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此表示对他的纪念。

此次重印，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和补充。

沈宝祥

2005年1月20日

序 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这是1978年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的结果。在文献上,这场大讨论被称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或“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结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从国史、党史的角度,还是从其他各种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等等)的角度看,要讲这一段历史,就必然要了解这场大讨论,就必然要从某一特定角度讲这场大讨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场大讨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场大讨论结束以来的这些年中,已有不少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论著在海内外问世。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这些年来,本人很有兴趣地拜读了不少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论著。这些论著或者记载了这场大讨论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史料,或者对这场大讨论作出了分析评述,提出了学术见解,从而对

这个课题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有些论著对这场大讨论的记载和评述,也确实存在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有的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有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恕我不客气地说,也有的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历史老人常常给似乎是不相干的人提供某种机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本人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居然发生了一点联系,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事。

大家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的文章,首先是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都不是偶然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起了带头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是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亲自创办的。创办这个刊物,是胡耀邦的主意。刊物的名称、性质、宗旨,以至刊期、形式等等,都是他设计的。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是实际上的主编,尽管当时没用主编这个职务名称。为了办这个刊物,就需要找几个人,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由于别人的推荐,我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我记得第一次会议是1977年6月4日,那时,一共四个人,外加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以后,陆续增加了一些人。胡耀邦就把我们这一摊子人称为“理论动态组”,或简单地叫做“动态组”。那时他批给我们的大量材料上都是这样写的。胡耀邦组建的这个理论动态组,作为中央党校的一个小机构,在组织系统上开始时属校刊编辑室,后来属于理论研究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在胡耀邦直接领导和指导下进行工作的。

由于参加《理论动态》的编辑和撰稿工作,我们这些人便很自然地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了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胡耀邦同志曾用“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受和写作期望。的确,那些日子是不平常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动和展开的那些不平常日子里,我们曾一起为取得的进展兴奋不已,也曾经对一些逆历史而行的现象表示愤懑,更为突破某一问题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想过要把这一段经历、一些事情作为历史记载下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况一再提示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段历史,有准确全面记载的必要。当我见到那些不准确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文字以后,更使我意识到将这一段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是我们对历史、对后人承担的一项责任。我们无权推托这项历史责任。但是,当年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由于各种原因,都已离开,只有我一以贯之地在《理论动态》编辑部工作。我觉得自己应当来承担这一责任。于是,我就产生了将自己经历的和知道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写下来的念头,并进而形成确立一个科研项目,通过调查研究,比较全面地写出这段历史的想法。尽管我感到干这样一件事有些力不从心,也不大够格,但历史责任感驱使我丢掉过多的顾虑,并增添了几分勇气。

好事多磨。我提出的这个科研项目也经历了一段曲折。我在1987年8月给中央党校校委领导写报告,要求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确立为中央党校的一个科研项目,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专著。这件事,无论是于理还是于情来说,都不应当成为问题。可是,当时的校长却在我的申请报告上写了这样一句:“我看必要性不大,发行后可能要赔钱。”这样的否定态度,这样的否定理由,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细想一下,又觉得也不难理解。1991年10月,我再次给中央党校有关领导写报告(校委领导成员已经改变),要求确